

西安事变



64·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64.8
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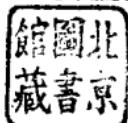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西安事变

徐 燕 编著

目 录

| | | |
|-----------|-------|------|
| 引子 | | (1) |
| 一、危难之秋 | | (1) |
| 二、“少帅”张学良 | | (6) |
| 三、“虎将”杨虎城 | | (11) |
| 四、三位一体 | | (17) |
| 五、暴风雪前夜 | | (22) |
| 六、兵谏华清池 | | (26) |
| 七、和战之争 | | (30) |



C

367886

| | | |
|---------|-------|------|
| 八、和谈与放蒋 | | (34) |
| 九、背信弃义 | | (41) |
| 十、抗战爆发 | | (44) |

引 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古城西安，寒气袭人。座落在市区南部的千年宝塔——大雁塔正准备拂去一夜灰尘，抖擞精神，迎接又一个黎明。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活捉了蒋介石和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又放了他？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哪些努力？张、杨在事变后的命运如何？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

本书将通过叙述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概况回答这些问题。

一、危难之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这是一首凄凉、悲壮的歌。每当我们听到它，思绪就会随

着那低沉、幽婉的旋律追回到 60 年前。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喧嚣了一天的东北大城市沈阳已经逐渐沉静下来，马达结束了轰鸣，车轮停止了转动。10 时 20 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划，由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村附近，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一侧，炸断了一小段铁轨和枕木。河本反诬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向驻守沈阳的张学良部发动进攻，炮击北大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系列武装挑衅事件，侵犯中国东北的企图昭然若揭。但蒋介石却令国民党东北驻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军北平（今北京）的张学良向南京政府电告情况，并请示可否还击，正忙于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的蒋介石急电指示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放一枪一炮，乖乖地退出了阵地。

一夜之间，东北重镇沈阳落入侵略者手中，张学良官邸 3200 万银元的黄金和 8000 万库银被劫掠一空，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被关东军全部据有，张学良部的 262 架飞机、3091 门火炮、26 辆战车、11.82 万支步枪手枪和 5864 挺机枪也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官方财产损失达 17 亿之巨。

不到一个星期，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

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悲怆呻吟，三千万苦难同胞在关东军的魔爪下痛苦挣扎。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侵占中国东北为满足。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已形成了侵占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在占领我国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坚持战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迫使日军三易统帅。蒋介石却下令撤退。十九路军在后无援兵，手无弹粮的情况下，被迫撤离。蒋介石派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浦东。

1932年3月9日，日本策动在东北正式建立伪“满洲国”，早已被废弃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1934年3月2日称帝。

1933年1月3日，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失陷。此后，日军相继占领承德、长城各口、多伦、张北、商都等地，重兵逼临平津，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湖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

部、内蒙东南部)，把河北省东部划为“非武装区”，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5月，向南京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月初，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7月6日，何应钦正式函复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要求，即所谓的《何梅协定》。6月20日，南京政府察哈尔省(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锡林郭勒盟)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秦土协定》。这两项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部分军队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策动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冀东22县脱离国民政府。12月18日，国民党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整个华北面临着成为第二个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揭露国

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发表声明、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白山黑水之间，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顽强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936年6月1日，宋庆龄、邹韬奋、沈钧儒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在北平，1935年12月9日，青年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公开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救亡行动相反，在国难日深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百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又派重兵围追堵截。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

王造时，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二、“少帅”张学良

1932年3月初的北平，春寒料峭，一阵冷风吹来，街上的行人不禁又裹紧了身上的衣服。西城北沟沿顺承王府内，三十几个人围坐在几张桌子旁，正侃侃而谈。桌上早已经摆好了美酒、冷盘。12时，1时，1时30分……仍不见宴会主人的身影。饥肠辘辘的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请帖上不是写的12时午餐吗？”“是呀，不知为什么……”当时针指向下午2时时，宴会厅里走进来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清癯，衣冠不整，甚至连领带都系歪了的人，他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原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学良在这里摆宴席，是为归国抗敌的留学生接见洗尘。虽然，赴宴者对张学良深染嗜毒恶疾已有耳闻，但见到他那副颓靡潦倒的样子，仍不免大吃一惊。熟悉他的人还清晰记得，多年前的张学良可是红光满面，英姿勃勃。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1901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兄弟姐妹共7人）。张作霖土匪出身，从一个“保险队”的头目，逐步成为执掌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东北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助皖反直，皖系失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张作

霖在北京设奉军司令部，除任东三省巡阅使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从“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兵败出关，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联省自治”。1924年，直奉战事再起，张作霖以胜利者的身份执掌北京中央政权，自称海军大元帅，人称“张大帅”。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进攻奉系军阀，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日本企图乘张作霖兵败之际完全控制东北，但张作霖却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奉日矛盾日趋激化。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7分，在张作霖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电控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运回沈阳后死去。

也许是张家长子的缘故，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参与军机，统领军队。1919年，进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学习炮兵，毕业后被授予炮兵上校衔。此后，步步擢升。1926年，已是陆军中将的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军团长，进兵河南，次年被北伐军击败，屯兵保定。张学良在京汉线上指挥奉军撤退的过程中得知其父被炸的消息后，强忍悲痛，沉着镇定，指挥军队顺利撤入京奉线。6月19日，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乘坐铁闷罐车秘密返回沈阳，承袭父职，于7月2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后，面临的形势十分险峻。一时间，少帅府说客不断。日本派专使林权助以吊丧为名来到沈阳，胁迫张学良“独立”。蒋介石派方本仁北上，劝张学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也

来到沈阳，助蒋活动，劝张“易帜”。张学良思忖再三，权衡利弊，决心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国家统一为重，毅然于12月9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当天，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蒋介石政权也暂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地，硝烟弥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百万大军，铁马金戈，互相厮杀，一时胜负难决。此时，张学良手握重兵，其向背对参战者的命运至关重要。各方代表云集求见，巧舌如簧，竭力争取张学良站在自己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派兵入关，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使阎冯势力迅速瓦解。10月9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又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因为蒋介石立下盖世奇功，而有此“殊荣”。张学良乘坐蒋介石派的专列进京，津浦沿线的车站上，到处悬挂着大标语：“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他到南京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从车站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一路上彩旗飞舞，锣鼓喧天，警车开道，众人簇拥。年仅30岁的张学良成了人们恭维、赞颂的“英雄”，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一年以后，又是“9·18”，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东北军全部撤退到关内，致使东北沦陷，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难，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转嫁罪责，迫使张学良引

告辞职，却又假惺惺地对他说：“汉卿，我与你同乘一舟，行将倾覆，若不先有一人下水，平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因此，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张学良含辱忍耻，代蒋受过，胸中有难言之痛，老父血肉模糊的惨景又浮现在眼前，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却又恨难雪，仇难报，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失声大哭。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赵…荻小姐和一批随行人员乘“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意大利考察。出国前，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德国医生密勒的精心指导下，在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周到服侍下，戒除了多年的吸食毒品的恶好。此后的张学良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又恢复了当年少帅的英姿。

1933年底，蒋介石为利用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次年1月8日，张学良回到上海，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从此，东山再起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推上与红军作战的道路。然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对人说，“国人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不叫我剿共，叫我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在武昌期间，张学良曾邀请流落武汉的东北同乡，在武昌明月桥畔聚会。他请到会者每人喝一杯又苦又涩的黄连水，要大家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陕北，蒋介石便撤消了鄂豫皖“剿总”，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于是，张学良又率领近

十万东北军来到陕甘。

11月，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五年前隆重热烈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到机场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张学良明白，受到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吃了败仗。想起五年来的经历，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苦甜酸辣咸，什么滋味都有，令他感慨万千。就在他还没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一天傍晚，副官把一份电报送到了他手上，只见上面写道：“11月24日，我军109师全部、106师部分，被匪军歼灭于富县直罗镇地区，109师师长牛元峰以身殉职……”犹如五雷轰顶，这封电报令张学良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话来。这已是他在西安上任后，东北军吃的第三个败仗了：10月1日，110师被红15军团歼灭于甘泉县的劳山，师长何立中阵亡；25日，红15军团又袭击甘泉以南榆林桥的107师619团，歼灭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

张学良是个精明人，接连的失利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对手，这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他开始为东北军的前途和出路而忧虑：这样和红军打下去，打回老家去的梦想还能成为现实吗？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南京的青年学生举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吼声就响在张学良的身边。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张学良也想尽快从内战的泥潭中拔出脚来，把枪口对准侵略者。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困惑中的他想起了老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奉天省（今辽

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与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新生周刊》。该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总领事认为是污辱了日本天皇。杜重远因此被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秘密到上海会晤了仍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建议他联合红军抗日,并指出,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身边又有一批爱国之士,可以与他合作,以形成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局面。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此后,他又找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希望李杜能帮助他沟通与苏联的关系,并郑重请李杜替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机进行商谈。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拜访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在听了他的倾诉后,热情鼓励他要振作精神,用积极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改变“不抵抗将军”的形象。

张学良的此次上海之行,使他那长期郁闷的心中透进了一缕曙光。他已理清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但是,怎样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呢?

三、“虎将”杨虎城

1935年11月的南京,虽然刚刚立冬,但严冬的寒意已笼罩了这座扬子江南岸的古城。人行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秋

风落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首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正在为109师兵败直罗镇而双眉紧锁，坐立不安。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进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大汉，只见他魁梧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透着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就是南京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杨虎城也是从西安来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但他没有住在代表们下榻的首都饭店，而是住在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今天他是专门来拜访张学良的。俩人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被称为西北“两只虎”，但东北军没入陕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自“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就要受张学良的节制了。从外表上看，他俩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但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学良英姿勃勃，年轻气盛，杨虎城则使人感到深谋远虑，沉着稳健。与张学良子承父业、青云直上不同，杨虎城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二十多年在腥风血雨的搏杀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杨虎城，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1893年11月生。自幼家境贫寒，只念过两年私塾，童年时就到一家小饭馆当徒工，烧火打杂。1908年，父亲杨怀福遭仇家陷害，被清政府绞死在西安，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痛。父亲的惨死，使这贫苦的家庭如同雪上加霜，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5岁的小虎臣，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债务累累，生计无着，使他对清政府的仇恨逐渐加深。不久，他和当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中秋会”，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杨虎城率领中秋会部分成员参加了陕西反清革命队伍，多次在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军作战，击败清军，后因不满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而退伍还乡。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大恶霸李桢，勾结官府，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1914年，杨虎城集合一批人，打死了李桢，为东南乡百姓除了一大害，受到贫苦农民的称赞，却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杨虎城被迫走上了“刀客”（陕西江湖人物的一种）道路，浪迹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阴一带与袁军作战，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他被委任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营长。在此后的“护法”之役中，他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转战关中，功绩累累，名扬三秦。陕西靖国军被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后，杨虎城拒绝收编，“保全革命人格”，坚持“靖国军”旗帜。后转战千里，退驻陕北。

到陕北之后，杨虎城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派人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在追随孙中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他历尽沧桑，几遭磨难，却始终未能如愿。此时又身患重病，心情更加愁闷。就在这时，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杨虎城介绍了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公开身份是榆林中学教员），两人一见如故，多次彻夜长谈。魏野畴向他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宣传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魏野畴的话，犹如

——泓清泉流入龟裂的土地，使杨虎城的心中又升腾起希望的力量。

驻军陕北，是杨虎城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杜斌丞、魏野畴的建议帮助下，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成立了教导队，聘请了几位军事专家，如赵青山、段象武等，还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这些人以后在杨虎城部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这个时期，为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国民军开战，派刘镇华率领土匪集团镇嵩军号称10万之众进攻陕西。刘镇华率部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西安城内守军只有李云龙所属国民军第2军第10师等部，兵力不足5000人，西安告急。这时，杨虎城急速率领国民军第3军第3师从三原开进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同守城。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二虎把长安”（李云龙又名李虎臣）。

“二虎”的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人，被十万敌军团团围在西安城内，敌众我寡，消息不通，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后期粮草断绝。一些人悲观失望，提出言和投降。杨虎城斩钉截铁地说：“虽留我一人，也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他们就是在这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抵抗，坚守8个月。终于依靠进步力量的配合，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于11月28日解围。这次守城之役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牵制了吴佩孚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